

晚清时潮中的顾炎武：援引、印刷及历史语境

沈洁

晚清士林的顾著阅读，既有曾国藩、章太炎这样的大儒，为经国大业、学术传承、道德接续；亦有汲汲为功名计、为稻粮谋的芸芸读书人。如何把彼时先贤的经义贯通入此时的经世，变而化之谓为通，这既是晚清士林的命题，也是政乱战乱丛集的民国永无穷尽的命题。

王国维在《沈乙庵七十寿序》中那句著名的话：“国初之学大，乾嘉之学精，而道咸以降之学新”，撮清学之要。明末亭林、梨洲、船山在国变之际沉郁并思考的君国、经世，经乾嘉以降士人们一百余年细琐功夫的淀积，值晚清，又被重新、大量提及。晚清学林对于国初之学的接续，“晚明三先生”在一个崇“新”的时潮中被援引，皆与时局中的另一种“国变”相关，亦与此“国变”中具体的制度及社会变动相关。

经世与变法

思想缘时势透迤，因此，在晚清中国“世变之亟”的当口，相较于黄梨洲、王船山，与经世相关更密的顾亭林是被引申较多的一位。晚清的顾炎武评述中，举曾国藩、梁启超二人为例。曾国藩说：“我朝学者，以顾亭林为宗。国史《儒林传》褒然冠首，吾读其书，言及礼俗教化，则毅然有守先待后，舍我其谁之志，何其壮也”；亦讲其“博大精微，体用兼赅”。而梁启超在1902年的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中说：“言清学之祖，必推亭林。诸先生之学统，不数十稔而俱绝，惟亭林浩然独存也。”他在后来的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，称亭林不但是经师，而且是人师，清代许多学术，都由亭林发其端，而后人衍其绪，“我以为现代青年，很应该用点功夫，多参阅些资料，以看出他的全人格”。

“宗”“祖”，概论了亭林在清学中的至高位置，而这个概括，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叙说者的语境。曾国藩之后，至梁启超的世代，是一个举国言变法、进而由变法走向了革命的世代。如何扶危救困、救亡图存是这一世代士林中的集体焦虑。于是，讲实学、讲经世的顾炎武自然位列其首。

自贺长龄《皇朝经世文编》之后的数十种晚清《经世文编》中，能看到大量的对亭林先生的引用。这些嘉道以来的士子，言及亭林，多援引其封建郡县论、

考试、铨选、吏治、赋税、钱粮、盐课、钞法、兵政、地利、舆图、河防、水利等论说。其中，尤以《日知录》和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被引述最多。略举两例。贺长龄《皇朝经世文编》中所收，嘉道间士人张杓写的《日知录跋》，称亭林先生“挟经世之才，怀匡时之志，慨然以世道人心为己任”。《日知录》：“自经史而外，凡国家政治，大而典制礼赋，小而馆舍邮亭，无不援据典籍，疏通其源流，而考论其得失，至于风俗之败坏，世教之陵迟，则陈古讽今，尤三太息。盖先生目击明季之政，故不觉言之深痛如此。”盛康《皇朝经世文续编》中所收，谢应芝（1795-1862）《书郡国利病书后》：“亭林山人博极群书，各因天下土俗所宜，采录大备，而莫善于西北水利。东南既无旷土，而西北尚多闲田，西北水利兴则屯戍行、粮赋减、漕运罢、河工省，一切杂税皆可弛，民克安其业，享其利，虽谓井田之良法复行于今可也。”仅列此两例，亭林身后，士人多数是在这样的“经世致用”语境中阅读和引申前贤的。而在嘉道、咸同年间，西学尚未大量引入，士林谈经世，尚无新的思想资源，因此，他们的谈论基本也不脱这个君国体制的框架。也就是陈天华所说的：“彼时学科不全，而当时风气，喜谈顾亭林、黄梨洲、王船山三先生之学说，于山川险塞、制度利弊以及行军理财，均反复研讨，以求深至。”

至光宣，士人谈亭林，亦未脱古为今用、“参酌吾国旧有之制度”；但由于西方政体、制体论说大量引进，有些援引走得，衍为一种中西杂糅的形态。尤以亭林“寓封建于郡县”的讨论对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影响为典型。诸如，冯桂芬在《校邠庐抗议》中关于“公黜陟”、“免回避”、“许自陈”、“复乡职”等篇内论说的，便是竭力将寓封建于郡县混合进新的地方自治方案中。康有为则更直陈地方自治“即古者之封建也”。而在黄遵宪、袁昶、戴鸿慈、端方等人有关自治与立宪的论说中，都能很清楚看到顾炎武的影响，甚而直接以泰西之地方议院比附“大儒顾炎武谓行封建之意于郡县之内”，“则外侮不能乘虚而入”。1906



石印本《日知录》

年《政艺通报》上《顾亭林日知录之地方自治说》一文：“今采录其议论政事各条之关于地方自治者，排比而释之，或参以己见，意在发明而止。近日寰宇竞侈言立宪，而立宪之根本，在地方自治；而地方自治，又不能纯取欧美之制移之吾国，遂可谓之推行而尽善也。参酌吾国旧有之制度，古先之成说，而能致谨于历史、地理、风俗、民性之间，然后可措之有利而无弊，则此篇之为，未可以其陈迹而尽弃之也。”古先之成说，是推行制度革新有效、有益的思想资源。经世之学到了晚清，衍化为“古为今用”，甚至“古已有之”、“西学中源”说。而邓实在《明末四先生学说》文中说：“亭林先生当晚季，目睹不学之患，故首以读书哭告天下，力矫明儒之空疏无用，而以经世实用为宗，遂以开有清一代实事求是之学。”亭林等人关于治道的种种论说，便因此与晚清中国的经世时风、改良政潮成功接榫。

“君国之变”、“种族之辨”

除“经世之学”，“君国之变”与“种族革命”是晚明三先生在晚清被复调、高调提起的另外两重缘由。

比如，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便是晚清梁启超、麦孟华诸君之于亭林的重新“发明”。1897年，

梁启超《万木草堂小学学记》：“顾亭林曰，天下兴亡，匹夫之贱与有责焉。……后世此义不明，即好学者亦每以独善其身为主义，而世变益莫之振救，不知栋折榱崩，其谁能免？即不念大局，独不思自保耶？”麦孟华《民义自序》：“顾炎武曰：天下兴亡，匹夫之贱与有责焉。是固保种族、存国教之先务欤！其亦海内魁桀之所宜有事者欤！”另一康门弟子刘桢麟1897年6月在《知新报》发表《论中国守旧党不如日本》：“中国今日之不振，士人实当坐其咎。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，匹夫之贱与有责焉，种族之华能，无非类之，惧君父之患，宁非臣子之辱，如其以存中国为心，则虽倡言守旧，吾不以责之也，如不以存中国为心，则虽日言变法，日事西学，适足为外人先路之导耳，奚论守旧！”亭林“保国者，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；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”之说，原有保国、保天下的分别，亦因分别，对不同人群有不同的责任判分；而晚清维新党人直接将这两层涵义合二为一，将“保国、保种、保教”糅为一体。

这种因“君国之变”演化而来的维新思想，在日益激进化的时风中便直接发展成了“种族革命”。其后的士林言说，顾、黄、王的经世学问，更多地被加入了“激动种姓”之义。邓实《国学无用辨》文：“明之季，国既亡矣，而北有夏峰、习斋，西有二曲，东南有亭林、梨洲、船山，皆思本所学以救故国，著书立说，哭告天下，而天下之人不应，漠然若毋动其中，其言不用，而神

州遂至陆沉。夫使数君子之学，得以见施于时，则亭林乡治之说行，而神州早成地方自治之制；梨洲（洲）原君原臣之说昌，则专制之局早破；船山爰类辨族之说著，则民族独立之国久已建于东方矣。是故数君子之学说而用，则其中国非如今日之中国可知也……惜其学不用，乃以成此晚近衰亡之局，而反以无用诬古人，古之人不更悲乎？”所以后来黄濬总结：“明末梨洲、船山诸儒，痛心胡祸，稍申君与国之辨。清网一密，诸说阒然。清未能知世界大势怵心亡国者，郭筠仙之外，唯曾劫刚。劫刚议论中，已大胆以国家为一单位，不复斤斤于‘圣清’‘我皇上’之习说。”汪国垣则直接说：“清季种族革命论，其远源实自黄太冲、顾亭林、王而农发之。”梁启超后来也曾概括过：“最近三十年间，把第一个一百年的思想全部复活。头一件，他们消极的和满洲人不合作的态度，到这时候变为积极的，卒至推翻清朝，建设民国。第二件，他们的学问种类和做学问方法，因为欧洲文化输入，重新发生光彩，越发向上进。”和满洲的不合作，“种族自卫，无滋蛮貉”，至清末，易化为推翻清王朝的种族革命之说，这同样也是时势之于思想的塑造，或者称之为“再阐释”。

科举、印刷相关

以上所述，皆为思想流转的历史语境；这个语境，也关联到实际的载体。在晚清中国，亭林以及顾著出版，有更为具体的制度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。事实上，亭林身后，他的思想和著作从未湮灭，在清代中国持续传布，除了家刻、坊刻，像《四库全书》《皇清经解》这样大部的出版工程中，也都收有顾著。只是，到了晚清，这个不绝如缕的炎炎烛火变得更像是一股时潮。人们更热衷于阅读和谈论顾炎武，不仅与作为语境的危局、国变有关，还与晚清中国所